

再國族化、國際化與本土化的角力：香港的傳媒和政治

陳韜文 李三峰

一 引言

香港回歸十周年，先後經歷不少風風雨雨。由1998年的金融風暴，到2003年的沙士肆虐、五十萬人七一遊行，及其後的特首更迭等，在這瞬息萬變的政治局勢中，傳媒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一方面，在市場力量及專業主義的推動下，傳媒繼續發揮為公眾提供資訊並以輿論監督社會的功能；但另一方面，不少研究亦指出，政治權力透過不同方式對傳媒施加壓力，香港媒介早於回歸前已開始出現自我審查的情況。

不過，若因此簡單論斷香港所享有的新聞自由已因政局變遷而死亡，或認定香港的新聞自由狀況絲毫未變，似乎都忽略了當中複雜微妙的變化。香港回歸中國，隨着主權轉移而興起的有關國家民族的論述和對國家的認同，已形成一股潮流；加上回歸後最高權力屬於中央政府，它對特區的政策成為最高指令，香港傳媒面對此等龐大力量，不得不作出調節。同時，過渡期間因中英權力互相制衡而衍生的政治空間，孕育出對本土文化的追尋和認同，一直延續至後九七的香港社會，本土社會仍然維持着相對獨立自主的發展邏輯，新聞自由既被視為香港成功的元素之一，亦成為彰顯「兩制」的特色。除此之外，香港作為一個開放型社會，早於殖民時代已經與世界融合，成為全球有機的一部分，傳媒與外國傳媒既有協作交流，有時也要面對外來的競爭；而文化行為同時受到西方的影響，衝擊本土和中國傳統的價值觀。整合起來，回歸後的香港成為再國族化、國際化及本土化三股力量互相角力的試驗場，這些變遷影響香港傳媒的形態和運作，而媒介的運作亦同時反過來影響社會和政治的發展。

在嶄新的政治形勢下，香港傳媒工作者和傳媒機構正面對甚麼挑戰？回歸後香港傳媒和政治的關係如何？在回歸前備受關注的新聞自由到底受到了多大

在香港瞬息萬變的政治局勢中，傳媒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回歸後的香港成為再國族化、國際化及本土化三股力量互相角力的試驗場，這些變遷影響香港傳媒的形態和運作，而媒介的運作亦反過來影響社會和政治的發展。

* 此項研究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撥款委員會 (CUHK4136/04H) 和復旦大學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研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的資助，謹此致謝。

的衝擊？本文將分析再國族化、國際化及本土化這三股力量如何影響香港的政治和傳媒，從中檢視回歸十年來香港的傳媒面貌。

二 靠向北京：再國族化下的香港傳媒

要看香港傳媒於回歸十年來所面對的處境，我們必須首先回顧香港社會的整體狀況。如引言提及，香港在這十年間出現了三個明顯的趨勢。第一是再國族化，第二是國際化，第三是本土化，三股力量此消彼長從而構成後九七的政治和社會生態。

所謂再國族化，是指香港在上世紀70年代本土社會和意識成形之後，怎樣在過去二十年來又再次跟中國大陸在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上整合。這過程至少可以追溯至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後所產生的一連串社會及政治變化，其中最重要的轉變便是中英二元權力的確立。隨着九七臨近，英國政府的權力逐步退減，中國的影響力卻與日俱增，香港因而出現兩個權力核心。殖民地政府在一些重要的政治及公共行政決策之前，均要諮詢中國政府的意見，甚至要得到中國政府的同意。同時，作為九七後的最高決策者，中國政府為確保順利過渡，開始着力統戰本地精英，邀請他們成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或是特區籌備委員會委員，甚或是政協委員等。獲委任的社會精英不乏傳媒老闆，如當時仍在《明報》掌舵的查良鏞^①。這種以政治委任拉攏傳媒擁有人或主要人員的做法在九七後仍然持續，如1998年中國政府委任當時仍是《星島日報》持有人的胡仙為政協代表。而在2003年，《東方日報》的老闆馬澄坤和《成報》的楊瀾亦被委任為政協代表。其他傳媒大亨包括有線電視母公司九倉集團主席吳光正和香港寬頻主席王維基亦榜上有名，而現時《星島日報》的擁有人何柱國及亞洲電視行政總裁陳永棋更被委任為政協常務委員。

對於中央政府來說，減少香港社會上對它的批評聲音是十分重要的。由於明顯的打壓只會得不償失，因此中央使用的是港英慣用的籠絡 (cooptation) 手段，即是向香港傳媒施予政治及經濟利益，換取善意和支持，以達致統戰的目的^②。不少傳媒鉅子深知和中央打好關係，對他們拓展內地生意有一定的幫助。這些傳媒老闆旗下的報章或電視台在報導中國大陸新聞時，為表禮尚往來，或許會淡化有關大陸的負面新聞，又或者在處理上會避重就輕，進行新聞人員所詬病的「自我審查」。也有在中國大陸有龐大投資的商人窺準傳媒機構的影響力，視此為與權力中心周旋或交換利益的籌碼，轉而投資傳媒。同時，報章漸由專業新聞工作者或所謂「傳統報人」之手轉讓至企業集團的手上。近年較受矚目的報章收購事件是煙草商人兼政協委員何柱國入主星島報業集團，而2006年電訊盈科主席李澤楷收購資深新聞工作者及著名評論家林行止旗下《信報》的一半股權，更被輿論視為「文人辦報」傳統在香港的終結。電視方面，亞洲電視也數易其主，但不變的是新的主事者都是親中人士。

中央使用的是港英慣用的籠絡手段，即是向香港傳媒施予政治及經濟利益，換取善意和支持，以達致統戰的目的。不少傳媒鉅子深知和中央打好關係，對拓展內地生意有一定的幫助。

傳播學者馮應謙曾以「非組織性集中化」(non-organizational concentration) 來形容這種傳媒生態^③。西方學者談論「集中化」時，通常是指愈來愈多的傳媒機構被愈來愈少的大集團所擁有。在香港，這種由大集團壟斷傳媒的情況並不明顯，個別傳媒機構大部分都由不同的企業所擁有，而這些由不同商家所收購的傳媒機構在財政、管理和運作上完全分開。不過，由於這些傳媒機構的擁有人有類似的背景和同樣的利益考慮，所以「非組織性集中化」在效果上很可能無異於傳媒機構被單一集團所收購。更具體地說，就是現時很多香港傳媒都受控於一群親中商人手裏，在此背景之下，傳媒擁有人對自身機構的影響便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實證研究課題。記者張寶華對十一份本地報章進行過研究分析。她指出在十一份報章中，有五份報章的老闆是中國政治組織的委任成員，與中方關係密切，而這幾份報章在報導中國大陸時，多贊同中央政府的政策，以及淡化有關中央政府的負面消息。另外四份跟內地有商業往來的報章，報導中國大陸新聞時則較為中立，但對中國政府鮮有強烈的批評。只有兩份和中國大陸沒有政治或經濟利益關係的報章，在處理新聞時沒有顧慮「北京因素」^④。

然而，再國族化並不只顯現於政治和經濟權力結構上。回歸後，香港和內地交往益見頻繁，新移民及內地遊客來港，香港人則北上消費及工作，兩地的生活模式互相影響，中港分野愈益模糊。九七前不少學者認為港人習慣將大陸人視為身份認同上的「他者」，但在九七後這種感覺漸漸消除，其中與中國大陸實際接觸愈多的市民，對中國的看法尤為正面^⑤。民意調查顯示香港人對「中國身份」的認同愈來愈強，而對中國的認同及對香港的認同亦呈正面的關係，顯示兩者並非互相排斥^⑥。這些改變亦反映在傳媒內容上，香港傳媒從前把中國描述為不文明、混亂和專制，極力建構中港兩分。現在，被中方統戰的傳媒固然致

香港傳媒從前把中國描述為不文明、混亂和專制，極力建構中港兩分。現在，被中方統戰的傳媒致力於給予香港人新的中國印象。同時，中央及特區政府亦在近年主動透過傳媒對香港市民宣傳愛國教育。



香港傳媒爭相訪問財政司司長唐英年的情況。

潘達文攝

力於給予香港人新的中國印象，就算是在政治上採納批判立場的《蘋果日報》，在報導北京奧運或中國太空人訪港等事件時，亦有意或無意地成為民族主義的宣傳者。同時，中央及特區政府亦在近年主動透過傳媒對香港市民宣傳愛國教育，除了安排太空人及奧運金牌選手訪港外，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在每晚的電視新聞報導前播放國歌。

隨着這些轉變和發展，有關中國的正面報導和媒介論述亦日益上升，港人對中國的感情和認同也隨之增加。這種感情認同的增加令自我審查此一傳媒現象更形複雜。一方面，自我審查的現象在傳媒工作者眼中一直存在，在回歸後更有加劇的趨向。在2001及2006年兩次傳媒從業員調查中，發現分別有14.0%和29.2%的傳媒人認為自我審查「存在並且問題嚴重」，61.2%和51.9%認為自我審查存在但不是很嚴重，只有約百分之三的新聞工作者認為完全沒有自我審查^⑦。當中認為自我審查「存在並且問題嚴重」的比例前後增加一倍，足以顯示出自我審查的狀況在新聞工作者眼中確有日益嚴重的趨勢。

但另一方面，隨着香港記者和內地官員的交流增加，他們對中國和有關的議題了解更深，對中國的認同亦有所提高，因而在報導時對大陸和中央政府的態度變得更加諒解及較少懷疑。有報紙高級編輯表示察覺此一情況，他認為自我審查並非如大部分人所想般嚴重，但認為媒介在處理有關中國的事務時，因為對國情了解日增而變得格外小心^⑧。我們可以用「文化共向」(cultural co-orientation) 來形容此一過程。如果說自我審查是傳媒工作者因政治壓力違反其專業判斷而行事，那傳媒工作者的「專業判斷」的改變則模糊了甚麼是自我審查。本來自覺的自我審查行為可能隨時間而習以為常，內化成為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判斷」。到了最後，當「習非成是」的新聞人員成為多數的時候，繼續堅持原有新聞判斷的人反而有可能被指為脫離實際和不夠專業。

以香港傳媒如何處理台灣的新聞為例。在回歸前後，有關台灣的報導是高度政治敏感的，那是因為香港傳媒和中國政府對台獨問題的基本意見並不完全一致。雖然香港傳媒從無表示支持台灣獨立，但對它們來說，有關問題是可以討論的。如有線電視就於2000年台灣總統選舉後專訪呂秀蓮。後來受到中方官員批評時，有線電視新聞部表示自己只是遵循新聞工作的客觀中立守則，讓台獨意見也可發聲。但對中國政府來說，國家統一的問題不容辯論^⑨。而自2000年以後，香港傳媒再沒有給予支持台獨的意見一個開放的廣播平台。到底這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我審查的結果？在多大程度上是因為香港傳媒機構及工作者本身亦愈來愈傾向反台獨的立場？要在實證層面上解答這問題並不容易，但這問題的答案對我們怎樣理解香港的新聞自由有很大的影響。無論如何，文化轉變和新聞自由是息息相關的。香港傳媒對台獨的立場愈益批判，但其實類似情況也出現在香港市民身上。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顯示，反對台獨的香港市民由1996年的58.8%增加至2006年的78.1%，而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度則於同期由24.5%增至45.5%^⑩。換句話說，文化共向不只存在於新聞工作者和中國政府之間，也存在於香港社會和大陸社會之間。

隨着香港記者和內地官員的交流增加，他們對中國和有關的議題了解更深，對中國的認同亦有所提高，因而在報導時對大陸和中央政府的態度變得更加諒解及較少懷疑。我們可以用「文化共向」來形容此一過程。

曾幾何時，向中國大陸靠攏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常被批評為「轉軌」。回歸十年，跟中國大陸整合已是大勢所趨，在最近的特首選舉中，就算是民主派候選人梁家傑也要在公開論壇上強調自己對國情的了解及跟大陸溝通的經驗和能力。再國族化不但滲透進傳媒以至社會整體的政經結構中，亦同時反映於傳媒工作者以及一般市民的情感結構裏。「轉軌」已不再是流行用語，而自我審查的界定也出現了改變，使香港新聞自由的狀況更加錯綜複雜。回歸十年以來，新聞人員心目中自我審查的現象確實日趨嚴重，但是以「平常心」視之的走向也應運而生，將來評價新聞實踐的標準會否真的顛倒過來，這很有可能是將來分析香港新聞自由的一個重要課題。

三 香港傳媒與國際社會

雖然再國族化在九七後對傳媒影響巨大，但香港傳媒並沒有變得和內地傳媒一模一樣。其中，「國際」因素對香港傳媒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事實上，香港一直與國際社會有緊密聯繫，在殖民時期的最後三十年，港英政府把西方的法治、人權、自由，甚至民主等價值及制度引進香港，而香港亦以開放的經濟體系聞名於世，這些價值觀已為香港人內化，並被視為香港成功的基石。回歸後，香港一直在「中國城市」和「國際城市」的雙重身份之間掙扎^①，特區政府也強調香港與世界接軌的重要性，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在任內表示要把香港變成「亞洲的國際都會」。「國際化」被認為是提高香港競爭力的良方。

與此同時，中國對自己在國際間的形象也愈加重視，加入世貿、申辦2000年及2008年奧運等行動，都顯示其加入國際社會的意欲。另外，為了向國際社會和台灣展示「一國兩制」運作的成功，中國亦不得不把國際意見一併考慮，不能公然與西方民主社會主導的「普世價值」相抗衡。事實上，香港的發展往往受到國際層面權力平衡的影響。中英兩國在1984年為了維持香港現狀而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和美國國會每年就香港狀況發表的定期報告，均可視為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中國大陸對香港的影響的國際力量。同時，英國、美國、日本等國家在香港都有龐大的經濟利益和為數或多或少的僑民。這些事實在客觀的層面上加強了香港社會的多元性，亦鞏固了香港新聞自由的社會基礎。

具體來說，國際社會對香港傳媒的影響有幾方面。首先，新聞專業主義是香港傳媒高舉且國際公認的價值。香港新聞工作者的專業理念向來都建基於西方自由主義的新聞觀，即媒介是民主社會中的「意見市場」或「公共領域」，而新聞工作者則是獨立於政治、經濟權力以外的個體，在報導政治問題時強調保持中立平衡、以事實為根據，並在適當的時候擔當第四權的角色，代表公眾不偏不倚地監督政府。由1996年到2006年的新聞工作者調查發現，香港的新聞工作者仍堅守着這些基本的專業主義。「堅持依據事實報導新聞」、「迅速為大眾提供最新資訊」，以及「報導可靠資訊防止流言散播」三項一直被認為是新聞媒介最重

香港對傳媒角色的理解和中國視媒體為官方喉舌的觀點相衝突。沙士期間，香港傳媒的表現正反映它們如何利用國際的價值來抗衡中國大陸。當中國大陸仍然封鎖有關沙士的消息時，不同的傳聞和謠言已在商業主導的香港傳媒間遊走。

要的社會功能。同時，新聞工作者認同傳媒必須監察政府，而幫助政府解釋其政策則被認為較不重要^⑫。

這些對傳媒角色的理解和中國視媒體為官方喉舌的觀點相衝突。2003年沙士期間，香港傳媒的表現正反映它們如何利用國際的價值來抗衡中國大陸。當中國大陸仍然封鎖有關沙士的消息時，不同的傳聞和謠言已在商業主導的香港傳媒間遊走。香港沙士的爆發讓傳媒的報導更鋪天蓋地，《蘋果日報》強烈批評大陸資訊封閉，並指控大陸官員是香港沙士爆發的元兇。香港的電台烽煙節目(phone-in programs)，尤其是鄭經翰主持的「風波裏的茶杯」，強調為市民發聲，沙士期間讓前線醫護人員將疫症的最新消息帶給大眾，又譴責特區政府官員隱瞞疫情。在中國大陸，新聞傳媒在報導沙士新聞時與官方口徑一致，於初期封閉疫情擴散的信息；在香港，因商業市場的考慮和專業主義的驅使，傳媒堅守反映現實的原則。事實上，香港和國際社會的緊密聯繫甚至可以給中國政府帶來壓力，當世界各地的報導均和中國的官方資訊相衝突時，中國政府亦不得不調整其立場，撤換衛生部長，並與國際社會充分合作，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導實況，提高處理是次危機的透明度^⑬。

要捍衛新聞自由，國際權威往往是香港新聞工作者訴諸的力量來源。在2006年的新聞從業員調查中，超過六成的受訪者選擇國際傳媒機構為他們心目中最理想的新聞機構。在新聞工作中遇到政治壓力時，香港傳媒可高舉國際的標準以自保。

香港沙士的案例突顯香港傳媒與國際社會的緊密聯繫，可以隨時獲得外地的消息並自由流傳，使香港成為有別於中國傳媒的資訊中心。此外，香港一直是不少國際傳媒機構派駐的亞洲地區——約一百家在香港設有辦事處^⑭，十三個衛星廣播機構以香港為基地^⑮，駐香港的外國記者有數百人^⑯；約有十多份國際報章和三十多份國際雜誌在香港註冊，而在香港印行的西方日報包括《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亞洲華爾街日報》(*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今日美國》(*USA Today*) 國際版、《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和《日本經濟新聞》等^⑰。沙士發生時，即時資訊在受感染的城市流轉，引起不同國家的傳媒競爭最新最準確的報導，達到互相監察的效果。推而廣之，國際傳媒對涉及中國的敏感問題如台灣問題等的報導，在一定程度上會迫使香港傳媒不能作出過份的自我審查，否則對國際媒體有所了解的市民會意識到香港傳媒的不當行為。另一方面，國際傳媒的報導亦為香港傳媒提供一個簡單的方法去處理有關中國的敏感問題，就是採取「被動」的姿態去引用國際媒體的報導^⑱。

要捍衛新聞自由，國際權威往往是香港新聞工作者訴諸的力量來源。在2006年的新聞從業員調查中，超過六成的受訪者便選擇國際傳媒機構為他們心目中最理想的新聞機構^⑲。事實上，在新聞工作中遇到政治壓力時，香港傳媒可高舉國際的標準以自保。例如在回歸後，香港電台屢受親中人士強烈抨擊，認為它不應批評政府，甚至建議它應變為官方喉舌。面對如此壓力，香港電台以國際上的公營廣播傳統(尤其以英國廣播公司)為依據和楷模，強調其編輯工作獨立於政府的重要性。而在新聞從業員的層面，國際力量也可舒緩來自高層的壓迫。有電視台時事節目負責人表示，有關敏感題材的新聞和時事節目如果能獲取國際獎項，便可以避免內部的批評^⑳。值得注意的是，就算中國官員在批評

香港傳媒時，也往往以國際而非內地傳媒作為比較的標準，最有名的例子莫過於江澤民在2000年於北京責備香港記者。他當時指出香港記者應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資深記者華萊士 (Mike Wallace) 作榜樣，而並非要求香港記者學習內地傳媒。

最後，國際化的影響除了彰顯於價值取向上，也同時反映於商業邏輯裏。電視報章等畢竟也是一盤生意，傳媒老闆當然希望賺錢。將業務擴展至其他國家，可以增加收入來源。例如《明報》在美國、加拿大四個城市發行海外版，《蘋果日報》也把業務拓展至台灣。前者在加拿大賺取理想盈利，2006年中北美洲的營業額達二億多元^②；後者表現亦持續理想，於台灣的銷量攀升至五十一萬份，廣告收入亦持續增長^③。海外收入縱使較為輕微，但是投資海外或可間接削弱中國的影響力，因為當中國市場不再是傳媒機構的唯一考慮時，傳媒機構的立場若盲從中國便會導致公信力受損，影響其本地以至海外業務^④。

不過，國際因素雖然可使香港免於全盤中國化，但反過來它也有保守的一面，如一些欲與中國大陸建立良好關係的海外商人，他們亦會透過投資香港傳媒以開拓中國大陸的商機。如馬來西亞華商郭鶴年及張曉卿，就分別在早年收購了《南華早報》和《明報》。儘管他們未必會干擾日常的新聞運作，但是可以想見，他們也不可能讓旗下的報紙猛烈抨擊中國政府。連一向強調資訊自由的跨國公司——例如雅虎——在受到中國壓力時，它們最後也採取犧牲資訊自由的妥協辦法，由此可見國際化所提供的平衡力量也是有其限制的。

香港市民的意見不能從議會反映，大眾媒介因而變成民意代表，承擔着提供討論平台、促進官民溝通、批評政府、提出政策建議和鼓勵社會改革的功能。一些傳媒以維護本土利益為賣點，批評特區和中央政府。

四 本土意識和利益的基礎

傳媒的發展決定於本土的環境變遷，它們根本就不能離開所在地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制度而有效運作；它們的內容、社會功能和收入來源莫不源於本土，跟本土利益密不可分。香港現代本土社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70年代中香港的經濟起飛，二次大戰後至60年代間在本地出生的新生代在這時期集體成長並視香港為家。而90年代香港正經歷去殖民化和民主化的過程，政制改革令市民對民主政治滿懷期望。由於中英權力對立而互相制衡，加上殖民政府對社會向來的低度干預，香港因而有空間發展自己的聲音，尋找本土的身份認同，香港人更借傳媒表達加快民主步伐的要求。

但是，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只是得到中國授權而未經過民主選舉的認可，落空了的政治期望與政治現實相衝擊，再加上九七年底的金融風暴，社會怨氣開始凝聚。在之後幾年間，工人面對結構性失業、新移民居留權造成社會分化、中產家庭因樓市大瀉而背負負資產、政府處理禽流感及其他危機時被視為無能等等，使得市民的怨氣日深。在社會對政府普遍不滿的時候，電台及報章為種種問題大造文章，政府弱勢而傳媒強勢，因而使有民粹主義傾向和具對立性的香港傳媒抬頭^⑤。及至沙士疫情的擴散和國家安全法例的粗暴立法，強烈的憤

蕙一發不可收拾，終而釀成2003年7月1日五十萬人示威。眼見政府管治失效，市民要求民主的呼聲愈高，有關尋找香港核心價值、公民社會的討論亦應運而生。

陳韜文和蘇鑰機曾以「代議功能」(surrogate democracy function) 的概念來解釋這段時期香港傳媒如何消除社會繃緊的狀態和一觸即發的衝突，並以此說明香港傳媒對社會結構缺乏民主的補充作用。民主低度發展，香港只有一部分民選的議會代表，而且他們的權力受制於行政主導的政府，市民的意見不能從議會反映，大眾媒介因而變成民意代表，承擔着提供討論平台、促進官民溝通、批評政府、提出政策建議和鼓勵社會改革的功能²⁶。傳媒的「代議功能」讓社會大眾發聲，共同投入香港事務以建構身份認同，傳媒擔當這角色既填補了香港政治現實的不足，同時也為自己找到定位，以抵消再國族化的衝擊。一些傳媒以維護本土利益為賣點，批評特區和中央政府。它們強調以公民社會為根本，而非以高高在上的官商巨賈為重，當中佼佼者如《蘋果日報》和電台烽煙節目；其中電台節目更經常邀請政府官員出席或來電，以回答聽眾的提問，主持人更不時直接向官員質詢，因而深受廣大市民歡迎，並對民意產生一定的影響²⁷。

傳媒為本土化推波助瀾，甚至反過來影響政治，當中最重要的案例就是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一些中國政府官員事後點名指《蘋果日報》和電台烽煙節目動員市民上街遊行。《蘋果日報》確實有動員的傾向，它在頭版刊登「走上街頭，不見不散」的大字標題，忽視傳統新聞實踐中把評論與事實分開的要求。但是我們認為動員和促進並不相同，動員要符合三個條件：傳媒對遊行持支持態度、讀者感知報章支持的取向及報章的態度真的影響讀者參與遊行。我們過去幾年的研究發現傳媒擔當了十分重要的促進功能，動員功能則難以證明。然而，即使是促進角色，傳媒參與也對民主遊行的產生起了重要作用。首先，傳媒大量報導有關民主遊行的資訊，使遊行成為市民大眾廣泛討論的議題。第二，傳媒報導社會領袖和政治團體上街的呼籲，媒體將這些領袖如天主教教陳日君或教協等的呼召放大，無形中將示威合法化。第三，媒介傳達「促進行動」的資訊(action-facilitating information) 十分重要，有助於讀者的具體參與²⁸。

固然，傳媒提供大量資訊，電台、電視及報紙循環報導，令本土的民主運動成為大眾的焦點，但是傳媒如何報導遊行更能影響大眾對事件的觀感。傳媒是構成公共論述最重要的一環，在五十萬人上街之後，不同的傳媒紛紛以理性、和平來肯定遊行，正面的評價令集體行動變得合理。2003年七一遊行後，第二十三條立法擱置，一些主要官員下台，甚至後來更迭特首，這些都被視為人民力量的勝利，「七一效應」的論述成為民意影響政治的象徵。

雖然傳媒在促進集體行動和影響大眾觀感方面舉足輕重，但是大眾的行動反過來也影響傳媒的運作。我們曾以「修正政治平行」來形容傳媒如何受民意影響。所謂政治平行(political parallelism)，指的是香港報章的政治意識分布和政壇上的政治光譜是平衡對應的。政治上若有保守和開放兩派，那麼在媒體間也有保守和開放的機構。我們的研究發現，在「民意激盪」(energized public opinion)

傳媒如何報導，能影響大眾對事件的觀感，大眾的行動反過來也影響傳媒的運作。即使是向權力靠攏的傳媒，也不得不強大的民意前有所收斂：服膺再國族化大潮的香港傳媒，在面對本土民意的衝擊時也需要作出調節；而抗衡再國族化的香港傳媒，則可以將民意看成本錢，抵抗權力中心的步步進逼。

的狀況下，傳媒需要回應民意，因而不同報紙的論述會變得類似，政治平衡會減弱，甚至暫時消失。在七一遊行的案例裏，最明顯的便是《東方日報》和《文匯報》兩份政治上較保守的報紙的轉變，如《東方日報》在七一前視外國勢力和政客為遊行的罪魁禍首，七一時卻向民意靠攏，將矛頭指向特區政府；《文匯報》亦由七一前完全支持立法，變為在七一期間建議大幅修訂法例內容，對遊行人士亦不再有負面的評述^②。當然，這並不表示它們變得和其他報紙一樣或者變得支持遊行，但是它們不得不作出修正，如不再貶低遊行人士或支持極不受歡迎的政府政策。縱使待民意較平靜時，政治平行會重新出現，但是這案例反映，即使是向權力靠攏的傳媒，也不得不在強大的民意前有所收斂。換句話說，服膺再國族化大潮的香港傳媒，在面對本土民意的衝擊時也需要作出調節；而抗衡再國族化的香港傳媒，則可以將民意看成本錢，抵抗權力中心的步步進逼。

不過，「本土利益」並不必然跟「再國族化」相衝突，因為香港和中國大陸的確不是在所有事件上都是對立的。同時，若國族化的政治意涵是保守的話，那麼香港的建制和社會本身其實也有保守的傾向。例如香港社會對「激進」行為的接受程度很低，或確切點說，香港社會很容易會將一些挑戰建制的行為視為「激進」。「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 以及「理性與務實」是香港公共論述背後的深層文化符碼，所以，社會運動積極份子對建制所進行的象徵性挑戰行為很難獲得媒介論述的支持。當公民社會中出現如公民抗命等抗爭行為的時候，傳媒或許會因應議題的特性，而在初期對這些抗爭行為表示理解甚至支持，但當事件一直延續發展時，到最後有關秩序或理性務實的論述還是蓋過公民自主的理念^③。所以，香港傳媒的表現和未來的發展，也取決於香港本土的政治文化發展，到底會是民主自由等價值的深化，還是保守觀念的抬頭。

在市場和專業主義的考慮之下，一些香港傳媒機構發展出一套應變策略，包括增加以正反意見並列的方式處理和當權者有關的新聞、增加採用民意調查作為「客觀」的民意指標、增加利用非政治的權威(如學者)評論時事，以及削減社評的批判程度。

五 三股力量互動下的香港傳媒與政治

如上所述，回歸後香港的傳媒與政治間的關係，便是在再國族化、國際化和本土化三股力量交錯下成形。香港主權回歸中國，特區政府在重要議題上要對中央政府言聽計從，但當中央與香港本土發生嚴重衝突時，特區政府也要回應市民的訴求，而為了使「一國兩制」的聲譽不在國際間受損，中國也不能經常公開地干預香港事務。反映於傳媒的表現上，政權易手固然令媒體在一些問題上有所顧忌，甚至向權力傾斜，但商業傳媒同時也有市場考慮，不少傳媒工作者對新聞專業仍有所堅持，再加上國際間對香港新聞自由的關注，都使得香港傳媒並未完全臣服於中港權力架構之下。

面對再國族化的潮流，自我審查是傳媒對政治壓力的回應之一。但在市場和專業主義的考慮之下，一些香港傳媒機構也發展出一套應變策略。這些策略包括增加以正反意見並列的方式處理和當權者有關的新聞、增加採用民意調查作為「客觀」的民意指標、增加利用非政治的權威(如學者)評論時事，以及削減

社評的批判程度^⑩。憑藉這些策略，當傳媒被批評時，它們便可抬出專業主義作為盾牌。一些以專業自居的傳媒在回歸後有強化其新聞客觀性的趨向。有前線記者表示，近年在報導新聞的時候，其機構的編輯多會要求把正反雙方的意見平衡寫出來，即使在個別議題上這樣做可能會模糊了新聞的重點^⑪。

換句話說，新聞客觀性在香港的政治環境下變成了一種抗衡政治壓力的武器，但對「客觀性」的強調亦同時限制着新聞媒界對權力擁有者的批判，削弱媒界作為第四權的功能。例如一項對2004年政制改革辯論期間兩份香港報章的社評的研究就發現，《明報》社評將自己視為中立的評論員，置於民主派和中國政府中間。它們又在社評中強調理性討論以解決問題^⑫。可是，這種以中立理性自居的評論卻對中國政府單方面否決2007、2008年普選缺乏強而有力的批判。推而廣之，當市民大眾在特定議題上認為傳媒應該對政府有所批判時，若傳媒只懂維持中立，市民便有可能將傳媒的行為視為自我審查。一個在2006年進行的調查研究便發現，接近半數香港市民認為，當中國大陸和香港有利益衝突時，香港傳媒是應該站在香港一邊的。而這些認為香港傳媒應維護本土利益的市民，同時傾向認為香港傳媒在中港衝突問題上有自我審查的情況。另外，同一研究發現，愈是認同傳媒在有民意基礎及事實根據時不必保持中立的香港市民，愈覺得香港的新聞自由正在減退當中^⑬。這些研究結果顯示，在如2003年沙士爆發及國家安全法爭議等涉及中港衝突的議題上，「客觀中立」的報導是不能令絕大部分市民感到滿意的。在可見的將來，涉及中港衝突的議題將為香港傳媒帶來很大的挑戰。

不過，我們並非對香港傳媒的情況一面倒的悲觀。事實上，在回歸之後，在面對明顯的政治壓力，如有中國官員批評媒介的時候，香港傳媒也會公開強調新聞自由的原則和新聞專業操守^⑭。而面對自我審查情況日趨嚴重，香港記者協會亦站出來呼籲新聞界努力提升專業水平，公正持平處理新聞^⑮。如前文提及，香港的新聞工作者沿習西方的標準，認為媒體應該獨立及扮演監守人的角色督促政府。香港超過一半的新聞工作者是主修新聞學的，而香港的新聞課程大多強調以專業態度對待新聞。新聞自由是世界公認的價值，即使中國政府也不能否定，更不能公然干涉。擁有開放自由的傳媒體制成為香港人的共識。可以說，作為一種理念和公共論述，專業主義的確是香港傳媒手上最有力的武器。問題只是在實踐的層次上，香港傳媒能否在一般所謂「客觀中立」報導以外發展其他的「專業」方法，來應付在不同類型議題上社會對傳媒的要求。

同時，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市場的力量亦可以制衡政治壓力。完全沒有公信力或專業操守的傳媒一定會受市民唾棄，而《蘋果日報》也是窺準市民的需要，旗幟鮮明地以敢於批評特區和中國政府作為立場，成為最受歡迎的本地報章之一。其他的競爭者若要考慮本地市場，便不可過份偏離香港本土的利益。《蘋果日報》的存在也同時緩和其他傳媒的壓力，因為其他媒體只要觀點不如《蘋果》激進，便不用承受太大的政治壓力。《蘋果》在商業上的成功，說明商業性的

新聞自由是世界公認的價值，即使中國政府也不能否定，更不能公然干涉。擁有開放自由的傳媒體制成為香港人的共識。作為一種理念和公共論述，專業主義的確是香港傳媒手上最有力的武器。

「鼓吹新聞學」(advocacy journalism) 跟其他強調客觀報導的傳媒，在香港這股再國族化的大流中，在政治上也有互補的一面，滿足了社會上不少人的需要。

雖然香港回歸中國，但仍然維持其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外國通訊社駐港，資訊自由發放流通，在香港要封鎖消息並不容易。例如沙士期間，內地傳媒初期配合官方隱瞞疫情，但在香港，各種小道消息和傳言已不脛而走，而且亦可以和不同國家的消息交相引證。與內地的傳媒不同，基於一國兩制的規範，中國政府不能辭退香港傳媒的主管。隨着中港進一步融合，香港人和內地人的往來頻繁，香港的廣泛報導亦無可避免地可以從非官方的渠道進入內地，加上國際對中國的高度關注，這種情況往往對中國構成龐大壓力，催使中國政府逐步改變態度，服膺國際社會要求開放透明的標準。

六 結 語

以上的種種現象反映回歸後的香港傳媒政治錯綜複雜，再國族化、國際化和本土化的影響此消彼長，社會政治的結構轉變、中港融合固然影響傳媒的運作，但專業主義、商業考慮和國際因素令香港的傳媒仍然保持相對的自主。作為一個正在急遽變遷中的社會，香港政治和傳媒將會繼續在這三股力量互動下蛻變。

直到目前為止，香港的新聞自由並未完全消失。香港電台沒有變成政府喉舌，《蘋果日報》繼續暢所欲言。不少傳媒工作者依然堅守新聞專業主義，以提供準確資訊和監督政府為己任。在「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的框架下，中國和特區政府也表示維護香港的新聞自由。不過，在這風光表面的背後卻是政經權力滲透而傳媒日漸馴化的景象：愈來愈多媒體的擁有權易手予親中商人、烽煙節目的衰落、自我審查的加劇等。隨着中港文化漸漸趨同，新聞從業員和市民大眾對中國的態度轉變，香港傳媒處理中國新聞時亦不如以往具有批判性。在這大環境下，香港傳媒的言論空間正慢慢收窄。

不過，畢竟內地的新聞價值觀並未把香港完全同化，傳媒在關鍵時刻仍會作出抗爭，尤其是當新聞自由直接受到威脅時，或是本地利益與中央利益出現重大矛盾時，它們甚至會和中國政府抗衡。國家安全條例立法的爭議就是最好的說明。大眾媒介積極介入公眾事務，同時促進市民的關注，引發民意的表達和大大小小的集體行為，使公民社會的空間得以擴張，同時也使傳媒不會完全脫離本土利益而只懂向權力中心讓步。最近的例子如保衛天星碼頭的公民抗命，媒體的論述並沒有完全以建制秩序來抹黑有關行動。這些運動的出現使反霸權的論述得以在媒體上展示，有效壯大本土的聲音。

不過，話說回來，隨着內地的經濟發展，香港會進一步倚靠中國，香港傳媒面對的政經壓力只會有增無減。香港能否保住新聞自由，固然要看一國兩制能否貫徹執行和香港的政制是否真的實行民主化，同時也要看傳媒機構和新聞工作者能否堅守新聞專業和市民大眾是否擁有捍衛新聞自由的決心。

香港的新聞自由並未完全消失。不少傳媒工作者依然堅守新聞專業主義，以提供準確資訊和監督政府為己任。不過，隨着中港文化漸漸趨同，新聞從業員和市民大眾對中國的態度轉變，香港傳媒處理中國新聞時亦不如以往具有批判性。在這大環境下，香港傳媒的言論空間正慢慢收窄。

註釋

① Joseph M. Chan and Yiu-ming To, "Democratization, Reunification and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A Critical Event Analysis of the Xi Yang Case", in *Press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Case Studies from 1967-1997*, ed. Clement Y. K. So and Joseph M. Chan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9), 465-95.

② Joseph M. Chan and Chin-chuan Lee,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Hong Kong Press in China's Orbit*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1).

③ Anthony Y. H. Fung, "Political Economy of Hong Kong Media: Producing a Hegemonic Voic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 no. 2 (2007): 159-71.

④ P. W. Cheung, "Press Barons and Press Freedom — A Study of Newspaper Ownership and Its Impact on Editorial Independence in Hong Kong after the Decade of Rule from Beijing", unpublished manuscript.

⑤ 馬傑偉：〈權力、媒體與文化〉，載李少南編：《香港傳媒新世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197-211；Eric K. W. Ma and Anthony Y. H. Fung, "Negotiating Local and National Identifications: Hong Kong Identity Surveys 1996-2006",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 no. 2 (2007): 172-85.

⑥ Francis L. F. Lee and Joseph M. Chan, "Political Attitud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Hong Kong Identities after 1997", *Issues & Studies* 41, no. 2 (2005): 1-35.

⑦⑧ Clement Y. K. So and Joseph M. Chan, "Professionalism, Politics and Market Force: Survey Studies of Hong Kong Journalists 1996-2006",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 no. 2 (2007): 148-58.

⑨⑩ 2006年8月個人訪談。

⑪ Francis L. F. Lee, "Strategic Interaction, Cultural Co-orientation, and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 no. 2 (2007): 134-47.

⑫ 調查可參見 <http://hkupop.hku.hk>。

⑬ Agnes S. Ku, "Postcolonial Cultural Trends in Hong Kong: Imagining the Local, the National, and the Global", in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Hong Kong*, ed. Ming K. Chan and Alvin Y. So (New York: M. E. Sharpe, 2002), 343-62.

⑭ Eric K. W. Ma and Joseph M. Chan, "Global Connectivity and Local Politics: SARS, Talk Radio, and Public Opinion", in *SARS: Reception and Interpretations in Three Chinese Cities*, ed. Deborah Davis and Helen Siu (London: Routledge, 2007), 19-44; Joseph M. Chan, "The Global-Local Communication (Dis) Synchronization: Interactions among Media, Individuals, State and Global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SARS Outbreak",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Epidemics and Transborder Violence: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Under a Different Light", Hong Kong Baptists University, 17-18 December 2004.

⑮ 政府新聞處於2007年3月提供的最新資料。

⑯ 參見 www.info.gov.hk/info/hkbrief/chi/living3.htm#media。

⑰ 此數來源為外國記者協會會員的約數，惟會員人數並不代表駐港記者之全部。

⑱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提供直至2007年2月28日的最新原始資料，本文再自行作分類。

⑲ Anne S. Y. Cheung, "Hong Kong Press Coverage of China-Taiwan Cross-straits Tension", in *Hong Kong in Transiti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ed. Robert Ash, Peter Ferdinand, Brian Hook, and Robin Porter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210-25.

⑳ 新聞工作者問卷調查於2006年6月至11月進行。

- ⑲ 〈明報企業出版業獲利減半〉，《信報》，2006年12月18日，頁22。
- ⑳ 〈證券報告——DBS降壹傳媒盈利預測〉，AFX，2007年2月1日。
- ㉑ 馮應謙：〈媒體競爭、擁有權及政治過渡〉，載《香港傳媒新世紀》，頁71-98。
- ㉒ Joseph M. Chan, "The Global-Local Communication (Dis)Synchronization: Interactions among Media, Individuals, State and Global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SARS Outbreak".
- ㉓ Joseph M. Chan and Clement Y. K. So, "The Surrogate Democracy Function of the Media: Citizens' and Journalists' Evaluations of Media Performance", in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2001*, ed. Siu-kai Lau, Ming-kwan Lee, Po-san Wan, and Siu-Lun Wong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249-76.
- ㉔ Francis L. F. Lee, "Radio Phone-in Talk Shows as Politically Significant Infotainment in Hong Kong",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7, no. 4 (2002): 57-79; Francis L. F. Lee, "Talk Radio Listening, Opinion Expression and Political Discussion in a Democratizing Society",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 no. 1 (2007): 78-96.
- ㉕ Joseph M. Chan and Francis L. F. Lee, "Media and Large-scale Demonstrations: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 no. 2 (2007): 215-28.
- ㉖ 陳韜文、李立峰：〈民意激盪中的傳媒趨同和修正政治平行——香港2003年七一大遊行個案分析〉，《香港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第31期秋／冬季號，頁71-95。
- ㉗ Agnes Shuk-mei Ku, "Constructing and Contesting the 'Order' Imagery in Media Discourse: Implications for Civil Society in Hong Kong",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 no. 2 (2007): 186-200；李立峰：〈政治轉變中的選舉詮釋和制度修正：2004香港立法會選舉「後選戰」個案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2006年第1期，頁69-90。
- ㉘ 同註⑩。亦可參考Chin-chuan Lee, "The Paradox of Political Economy: Media Structure, Press Freedom, and Regime Change in Hong Kong", in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d. Chin-chuan Lee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288-336.
- ㉙ 2006年10月個人訪談。
- ㉚ Francis L. F. Lee and Angel M. Y. Lin, "Newspaper Editorial Discourse and the Politics of Self-Censorship in Hong Kong", *Discourse & Society* 17, no. 3 (2006), 331-58.
- ㉛ Francis L. F. Lee, "Hong Kong Citizens' Belief in Media Neutrality and Perceptions of Press Freedom: Objectivity as Self-censorship?", *Asian Survey* 47, no. 3 (2007).
- ㉜ Tuen-yu Lau and Yiu-ming To, "Walking a Tight Rope: Hong Kong's Media Fac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since Sovereignty Transfer", in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Hong Kong*, 322-42.
- ㉝ 香港記者協會於2007年2月10日的「香港新聞自由調查結果公布暨研討會」向同業呼籲必須緊守崗位，努力提升專業操守水平，重建市民信心。

陳韜文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長江學者講座教授。

李立峰 香港城市大學英文與傳播系助理教授